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唐朝 中央集权 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

李鸿宾 著

民族出版社

TANGCHAO ZHONGYANGJIQUAN YU MINZUGUAN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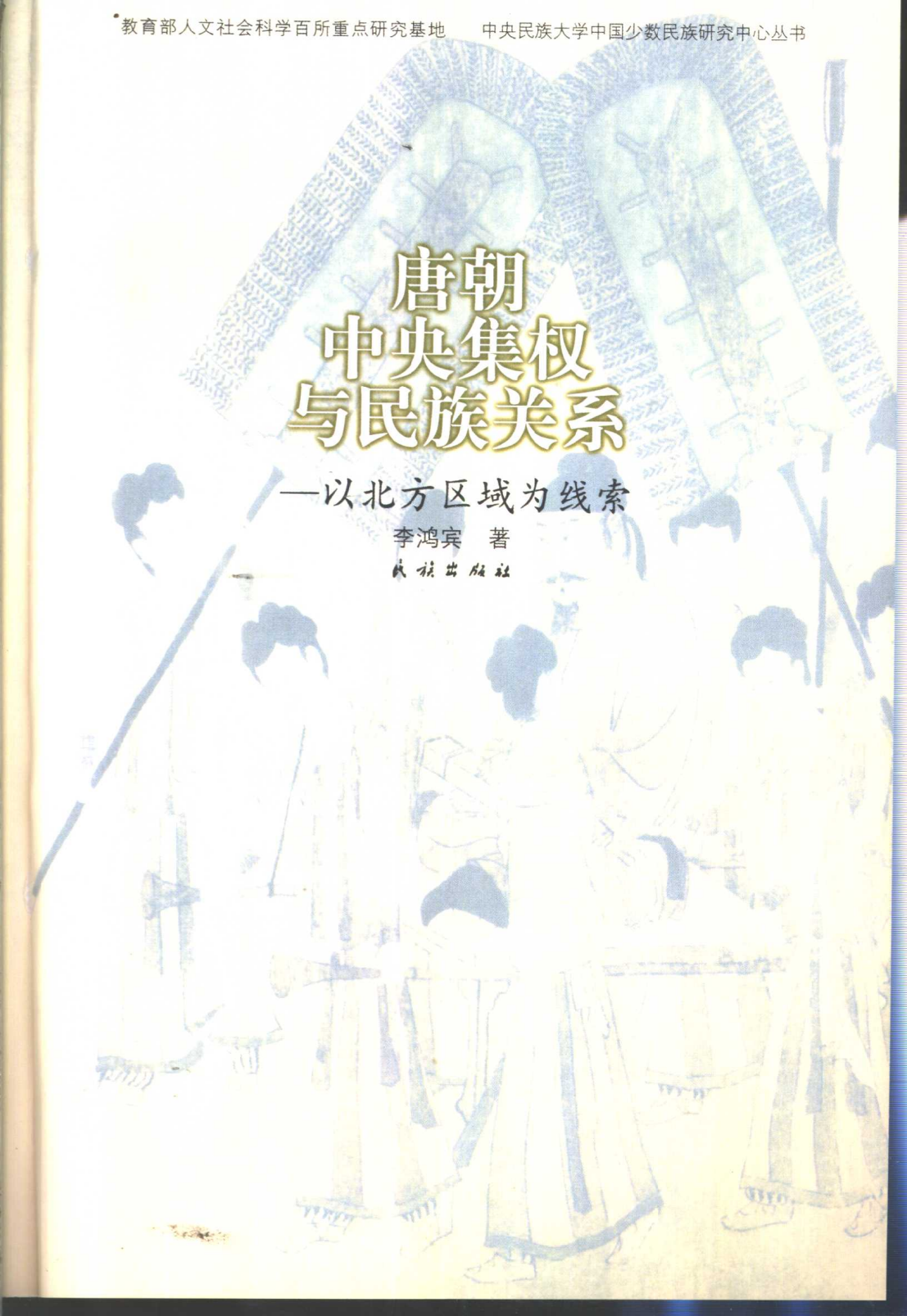


唐朝 中央集权 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

李鸿宾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装帧设计：翟跃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李鸿宾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1

ISBN 7-105-05269-4

I. 唐… II. 李… III. 民族关系-研究-中国-唐代
IV. D6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982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9.80 元

序

令我非常高兴的是，鸿宾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一部学术新著，即将正式出版面世！我们的专业为历史学学科属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即原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科，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研究方向。专业方向要求，博士论文应以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鸿宾所擅长的学术领域集中于隋唐五代历史，因而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这一历史阶段。

正如作者所说，在一篇博士论文里，讨论的问题不能过多，范围也受到限制，选择什么样的课题来做，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是个贯穿中国历史整个过程的行为，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文明进程上看，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就有多种文明分布，并且呈现着向前发展的态势。今天学术界一般将中国文明的源头直接与新石器时代连接在一起，时间距离今天有七八千年之久。如果从王朝算起，人们将夏朝的起始定在公元前 2070 年，那么距离今天也有四千多年。中华民族至少从那时就已孕育并活动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以农耕生活为核心、农牧相结合而展开的发展态势，一直成为亚洲中华大地上的中心内容，而且持续到以后的历朝历代。到了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国土范围最终得以确立，而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近代中国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但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反而在与他们的斗争中走向了自觉，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一章导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在这样漫长的时代里，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中华民族发展的轨迹如何界定，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费孝通教授等把中华民族发展的特征概括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大陆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这个理论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应该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然而，如何具体地进行论证，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各民族之间的分合、分合背后的发展规律等，仍旧需要我们认真细致地研究和探讨。我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就是具体地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在鸿宾学习的前后，我们已相继地有几位同学也是以同样的方向撰写了或正在撰写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论文，当然都是具体地讨论某一个朝代的。我相信，在这些具体朝代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必将对这个理论有深入的阐释。

唐朝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作为中华民族自在的阶段，唐朝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尤其是唐朝的统治集团，在处理当时的民族问题时制定了许多的方针和政策，对维护各民族并使之处在中央王朝的统辖之内，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学术界一直称道唐太宗视华夷一家的观点，成为古典社会处理民族问题的精华而被提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给予关注并细心地研究的。李鸿宾同志的论文正是从这方面着

手的。他以前曾经撰写过《唐朝朔方军研究》一书，以长安北部朔方军的起源、发展和转化为线索，探讨了唐朝与北方和西部突厥、吐蕃等民族势力的交往，勾画了唐朝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结成的各种关系。这为他撰写博士论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至于本书研究的具体内容，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各章节。据我所知，本书（论文）的写作始于1999年中期，至2000年12月完成并答辩。前后的时间大概一年半。后来他又有所修改，但是基本的架构没有变化。应该说本书是他对中华民族在唐朝的发展问题所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唐朝的民族问题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与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前期民族观念的开化与后期民族观念的保守，主要是因为前期中央王朝处在强势的地位和后期王朝地位下降造成的。这是他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些，读者可以自己去了解，可以进行争论和探索。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不断地对历史问题进行思考，鸿宾同志只是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相信，随着更多同志的参与，他所研究的问题，乃至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将会更加清晰明朗。

顺便说的是，鸿宾对本书的撰写，因为时间比较短暂，我认为有许多问题仍未涉及到，即使涉及的，也只是初步的讨论，其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正如我上面说的，本书是他对唐朝时期中华民族发展问题所进行的尝试，既然如此，必有诸多粗浅之处，这一点，我作为指导教师是毋庸讳言的。我希望他在现有的基础上，今后继续钻研和探索，对唐朝和中古时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更有价值的研究。

陈连开

2002年8月于三乐居书斋

内容提要

本书是从民族和政治的角度论述唐朝社会前后期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变化的趋势，主要着眼于中央集权政治与民族关系互动的层面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的衰弱导致中央对地方的失控，使得周边各种势力迅速崛起，并向中原拓展，形成了北族南下、建立政权的纷乱局面。中原的世族和政治势力则南渡长江，据守江左，进而与中原对峙。这种形势的重要结果，是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与同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隋唐二朝，尤其是唐朝，其民族观念和心态，均较开放，少有阻隔。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的互融，表现在中原传统文化吸入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文化 and 种族因子；亦表现在北方胡族接受汉文化、并入中原的持续过程。就基本趋势而论，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表现的是胡族文化的迅猛介入，胡化趋向明显。到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成为主流，其趋向则是胡族的汉化。承此基础开创的唐朝，主流上表现了民族观念淡漠、种姓不分彼此的文化理念。隐藏在这种理念背后的则是唐朝的雄厚实力。唐自开国后，在遏制突厥的同时展开了向周边拓展的强大攻势，它先后征服了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强权势力，尤其是征服东突厥，唐朝获得了控制北部广远地域的机会。唐迅速建立起羁縻府州，起用各族部落酋长和首领充任都

督、刺史，构建了将中原与周边联为一体的统治体系和分布格局。

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崛兴了吐蕃政权；远在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大食）也迅速壮大，并向周围拓展。唐朝征服东突厥之后，开始向西域进发，先是与西突厥竞争，随后又与染指此地的吐蕃展开以安西四镇为中心的争夺战。应该说，唐朝的扩展已经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朝代，其强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持住这种局面。公元7世纪初期亚洲大陆的强权势力（吐蕃、大食、北方草原势力等），迫使唐朝不能无限制地拓展，彼此之间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较量。吐蕃咄咄逼人的北上东进，在7世纪后期打破了唐朝的拓展战略，遏制住唐朝的攻势。突厥人乘机恢复了帝国，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又称后汗国）政权。到8世纪中期，唐朝内部以安禄山为首的地方节度使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打破了唐朝的战略格局，王朝从此逆转，逐渐地丧失了中央一统的强力。事实上，节度使御边体系之形成，正始于唐朝攻势战略破坏之时。节度使体系取代前期的府兵戍卫、边军御边、行军征讨的格局，表现出唐朝攻守战略转移的倾向（即攻势转向守势）。由于王朝威势的削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即原来中原与四夷的互融和彼此不分，逐渐转向内外有别，华夷观念再次分化。

后期的唐朝，事实上形成了以长安、河朔等各自为中心的不同地域，长安朝廷控制的地域与河朔地区蜕演为文化的差异与种姓的分化。河朔百姓熏染胡风，不尚儒礼，政治上不受朝廷支配，唐朝中央集权受到空前的挑战。其威势虽经德、宪诸朝的努力有所提高，但始终未能复原。到唐朝末年，内外矛盾的激化导致唐廷的覆没，北部的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逐渐结合，形成了新型的权力格局，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夏、回鹘人建立的几个小王朝与汉人建立的北宋王朝，成为新时期并峙的现

象。权力格局的分化，是导致唐民族观念分化的政治基础。就后期而论，唐朝华夷不分的观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被华夷之别所取代。后期的社会观念，随着中原传统的复归，特别是儒家的道统追寻而得以强化。唐长孺指出唐朝后期社会的南朝化倾向，说明魏晋以来中国所受胡族文化影响的终结和中原正统文明的回复^①。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文化保守风气的崛起。这种风气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则是华夷分异观念的重新强化，它使唐朝统治集团走向闭塞，决策保守，进而在丧失支配地方权力的情势下引发地方民族势力的分立。这种分立局面的结束即全国一统王朝的再建，则晚至元朝。再建的强有力因素，仍然是中央政治的一统集权。因此，本书认为，唐代时期民族观念的开化或闭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强力联系在一起；唐朝民族观念的内涵不是抽象、概括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的。易言之，中央王朝的威势存在与否，则是引发民族观念变更的重要因素。唐朝前期民族观念的开放即华夷不分，后期夷夏的分化，正是中央强力转变的结果。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它本身附着于政治权力。随着唐朝中央王权的兴衰，民族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我们以唐朝为例，对公元7—10世纪的民族问题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具有普遍的意义，即唐朝的民族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当我们强调中华民族大一统发展的趋势之时，分析其中演化的曲折和复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趋势的规律，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因。

^①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综论，第475—491页；参见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缘起与论证	(1)
第二节 “民族”与中华民族之发展	(12)
第三节 中华民族在唐朝时期发展的基本轨迹	(18)
第四节 相关研究概况	(26)
第二章 唐朝的建立与多民族发展	(3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唐朝的影响	(36)
第二节 唐太宗处理民族问题的观念与政策	(41)
第三节 唐初民族概念的现实背景	(47)
第三章 非汉族南下与分布格局	(51)
第一节 胡汉民族与区域分布	(51)
第二节 非汉民族的南下	(57)
第三节 入唐蕃族发展的基本趋向	(64)
第四节 分布各地蕃族状况的典型分析	(67)
第四章 羁控手段与形势的剧变	(99)
第一节 突厥的南下与羁縻府州的设置	(99)
第二节 形势骤变与羁控方式的转化	(106)
第三节 御边体系的构筑	(114)

第五章 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	(120)
第一节 河北道的蕃族·····	(121)
第二节 安史之乱反映的民族问题·····	(128)
第六章 中央王权的衰弱与文化的分区·····	(141)
第一节 安史之乱对中央王权的冲击·····	(144)
第二节 文化的分区·····	(153)
第七章 王朝威势再复及其失败的后果·····	(162)
第一节 德宗对藩镇的用兵·····	(163)
第二节 宪宗对藩镇的用兵·····	(169)
第三节 穆宗政治的施展及其失败·····	(176)
第八章 地方军事势力与边区民族势力的结合·····	(182)
第一节 晚唐的中央与地方·····	(184)
第二节 道统的复兴与华夷之别·····	(192)
第三节 地方民族势力的崛起·····	(201)
第九章 结 语·····	(214)
附录一 《唐代墓志汇编》所见非汉族 情况统计表·····	(223)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49)
附录三 作者学术档案·····	(265)
后 记·····	(26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的缘起与论证

本书之撰写是在 1999 年上半年，当时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拟订的题目是“唐朝政策调适与民族融合分解之关系——以朔方军及西北区域为线索”，后蒙不弃，正式立项。而这时候我也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专业是中国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方向则是中华民族形成史，这个题目也适合于我的学位方向。经过与导师陈连开教授商议，我便以同样题目作为学位论文。在撰写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原来的题目涉及的是中央王朝政策的制定与民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的意图是从中央政策的角度研究唐朝的民族问题。但是这种政策很多，而且有不同的表现层次，其中是否存在着某个或某些主要的因素在起支配的作用？我认为是存在的。我感觉到中央王朝自身的强盛与否，关系到民族政策的制定或改变，这个因素超过了其他因素，成为我所注意的问题，所以又将原来题目稍作改动，成为“唐朝

中央集权与民族融合分解之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这个样子。

我论证的主题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民族融合与分解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华民族形成今天的 56 个民族大家庭的局面，正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对此，学术界已多有讨论。但是，中央集权的政体在中国民族融合与分解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和怎样的作用，其具体的情况如何？这仍然是一个尚待解释的课题。以往的研究，比较侧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中华民族之间彼此不分、共同发展的历程。这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还有些不完善，特别是在凝聚力增强的过程中对中央集权的作用重视得不够。而这恰恰是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我选择本课题的意义和价值。

主题既已选定，接下来的是如何论证。中央集权对中国民族发展产生的影响，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全部。那么，在一篇博士论文里想要全面地阐述，显然是不可能的。我选择的是历史上的 7 世纪～10 世纪，即唐朝时期。之所以选择这个阶段，一是唐朝处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强盛时期，当时民族活跃，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动频繁，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和典型性；二是我本人从事的学术研究也以这个阶段为中心，对唐朝历史有些研究心得和体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的撰写较有把握。

我所涉及的课题至少包含两个学术领域。一是唐史，二是中国民族史。所谓唐史是指学术界以断代史为研究重心而形成的学术领域，主要侧重于实证性研究，以具体的史实作研究对象。而民族史则是以古代各民族和民族关系为对象，探索民族前后的发展和变化，比较注重通性，追寻其间的演变轨迹。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少的差异。根据我申请和在学的情况，我更多地是从民族史的角度立论的。我在学的研究方向贯穿中国民族史的古今，

范围很宽，以个人之力很难跨越不同的朝代，因此鉴于我研究的领域，自然选择了唐朝。

然而从断代史的角度着眼，以一篇论文研究唐朝的民族问题，也非常宽泛。于是我进一步调整，重点研究中央王朝之强弱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以此为核心，探寻其间的变化和轨迹。论文的副标题是“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意思是说全面涵盖唐朝的民族关系也不现实。我之选择北方地区，因为我曾撰写过《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一书，对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民族较为熟悉，而对南方和西南的民族则甚少涉入。说到这里，我至今有个想法，即唐朝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四夷结成的关系差别很大，当时所谓的民族群体南北之间差异超出今人的想象。北方和西北的民族自身认同感早已产生，并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他们与汉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而南部中国的民族群体尚未形成系统和独立的自我认同，群体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民族观念也相对淡漠。所以北方区域的民族关系可能更具有典型性。

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就本论文涉及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其中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白翠琴研究员和本系徐庭云教授认为论文题目中的民族“分解”一词表达的意思不确切，而我力图阐释的是中央集权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唐朝前后期很不一样。“分解”究竟是一个民族内的分化，还是不同民族的分化，这的确要搞清楚。于是改成“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这样的题目。

二

关于答辩委员会委员对论文提出的意见，我想再申述几句。因为这些建议对本书的修改和完善帮助尤大。这些意见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就唐宋转折时期表现的民族问题而论，除了中央集权的影响之外，是否还存在各民族自身的因素？

第二，对问题的论证，如果包括南方和西南区域，将会更有助于问题的阐述。

第三，肯定中央集权对民族融合的重要性是没有疑问的，但将它理解成民族关系融合与交往中最重要的作用则有再考虑的必要。中央集权对具体的民族交往是否有作用？如果按此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就不会有融合交往。所以民族融合交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问题所谈的唐宋社会转型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唐朝后期民族问题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似乎讨论得不多。本文对后期民族的立论，着眼于中央集权的衰弱导致中央对地方和边区民族控制力逐渐丧失，使得唐末和五代时期出现地方自立与民族分离的现象。而民族自身也有各种因素，从理论上讲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具体个案性的研究，而且需要时日，目前我还不具备回答此问题的能力。但这给了我今后研究的空间。

第二个问题在上文里有所交代。

第三个问题涉及的民族关系不论在王朝强盛的隋唐，还是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或五代，都始终存在着。的确，政治、经济、文化，这些都是促进民族交往的因素，不可忽略。但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很多，我研究的问题并非不认同这些因素。我之选择中央集权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这个角度，还有一点，即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依附于政治问题的，而中央集权又是政治的主要内容，因而它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英国学者史密斯说：“把民族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然后把它放回到产生它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域里，好像这样恶魔就能再次被封存在有名的上帝之瓶里。不幸的是，这样的思想说明了它对民族

主义的本质存在严重的曲解。……‘用非政治化’的手段超越民族、取代民族主义的方针是会失败的。”^① 这说明民族与政治不可分离。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在唐朝则体现在民族与中央集权的关系上。在唐朝控制的范围内，中央集权对民族关系的走向，具有方向性的把握。随着中央威势的削弱，民族关系开始转化，最终出现地方民族势力的分离。然而在王朝集权势力丧失之后，民族融合与交往并未因此而消失，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关系不如唐朝控制下的那样密切，离心的倾向也在增加。这反过来说明中央集权在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因素不能代替的。

三

在如何论证的问题上，论证的方式就成为重要的课题。自从20世纪初叶以后，随着西方民族概念的介入，它逐渐地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中国人也开始了对自身民族历史的溯源。于是，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相继出现，为世人所瞩目。学术研究中，民族自然成为考察和探索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将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模式。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发展进行的最有说服力的概括。本书即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展开论述的，目的旨在研究公元7世纪~10世纪中华民族如何发展、呈现何种趋势的运作过程，以及过程背后的原因。

在这个理论之下，本书探索的民族问题与前贤和时贤有什么

^① 见[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汉译本，第13、16页。

不同呢？

就方法论而言，前人研究隋唐五代的民族问题时，遵循的是由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演绎规律，其视野则集中于当时或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本书属于专题研究，在吸取前人与时贤成果的基础上，以唐朝前后社会的变化为背景，重点研究中央集权与民族的关系。同时从中华民族前后发展演变的过程考虑，观察这三百年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具体运作。

这个理论对本书的构建与具体写作有什么意义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它也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争论。其中涉及的一个层面就是“多元”和“一体”的概念问题^①。我认为，“多元”主要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不是单一而是多种来源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呈多种途径或方式；然而，各个民族、势力之间的关系却是愈来愈密切而不是疏远，其演变的方向则明显地呈现出一体的趋势。

“多元”的概念破除了以往人们关于中国文明的黄河“一元”说，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②，论证了中国文明来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学术界在讨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有将其划为六大区系和九大区系的说法^③。这些说法和划分的区域可以再

① 参见陈连开：《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及其多元一体》（讨论综述），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406页～424页。

② 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39页。

③ 见苏秉琦同上书，第37页；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同作者《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第111页～139页。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区域探讨，考古学界近一二十年以来有较深入的研究，其代表学者主要有夏鼐、安志敏、石兴邦、佟柱臣、严文明、余伟超等。